

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

# 工作简报

第十四期

二零一三年一月编印

---

## 目 录

### • 学术活动 •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十一期纪要……………1

附：研习会发言文稿

马克思主义 VS 无政府主义——回顾马克思与巴枯宁 林钊……………9

### • 简讯 •

异质性哲学的包容性和批判精神

——“第一届异质性哲学研讨会”顺利召开……………19

本期责任编辑 宋扬

• 学术活动 •

##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十一期纪要

**时间：**2013 年 1 月 8 日

**地点：**中山大学南校区文科楼八楼马哲所会议室

**主题：**马克思主义 VS 无政府主义——回顾马克思与巴枯宁

**主讲人：**林钊（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主持人：**郭忠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评论人：**谭安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其他与会人员（姓氏首字母音序排列）：**邓伟生、郝亿春、林进平、林育川、刘森林、龙霞、马天俊、马万东、谭安奎、谭群玉、田明、徐长福等学者，以及 10 多位博、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

**录音整理：**冯波（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博连读生）

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十一期于 2013 年 1 月 8 日下午在中山大学文科楼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会议室举行。本期研习会主题为“马克思主义 VS 无政府主义——回顾马克思与巴枯宁”，主讲人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博士后林钊老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郭忠华教授主持了本次研习会，政务学院谭安奎副教授做点评。

林钊在研习会的一开始就介绍了他“回顾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争论”的目的，即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十九世纪中，一同产生并拥有相同起源（即黑格尔哲学与法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无政府主义之间却彼此仇视，这种亦敌亦友的思想关系值得深思；而巴枯宁作为马克思一生之论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在当今学界却少有问津。无疑，研究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争论，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

之后，林钊介绍了两位论敌——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交往过程。林钊研究发现，马克思和巴枯宁在个性和生平都有相仿之处，生平三次会面，均发生在彼此人生的重要关头。1844 年在巴黎第一次碰面时，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

并从黑格尔主义者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而巴枯宁则在蒲鲁东的引导下从黑格尔转向无政府主义；1848年在布鲁塞尔第二次见面时，马克思正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以指导革命，而巴枯宁则对已经点燃的革命之火跃跃欲试；1864年在佛罗伦萨第三次见面时，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的大部分写作，并成立了第一国际，重新进入政治，而巴枯宁则以欧洲革命英雄的身份回到欧洲。而且，在两人初次见面时，他们之间就已经开始有所间隙；第二次时，两人对彼此的反感就更加明显了；第三次见面虽然有短暂的合作，但也很快分道扬镳。在1872年的第一国际的海牙大会上彻底决裂。可以说，巴枯宁是马克思的一生之敌，他们不仅相互夺权，而且其争论竟长达三十年之久，那么他们之间的思想争论主要有哪些呢？

关于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争论，林钊首先谈到的是“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国家”这一关键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与巴枯宁在革命的终极目标上都是要实现“人民的自由联合”，所以可以说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在如何实现“人民的自由联合”的问题上，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产生了致命的分歧：马克思认为工人首先建立自己的政权，然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过渡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状态，所以“人民国家”是必要的；而巴枯宁则认为国家本身就是恶，就是阶级对抗的产物与表现，它不会因为工人掌权就会更变其恶的性质，先进的工人成为统治阶级后就会统治和压迫落后的农民，由于人对权力和欲望的贪婪的天性，工人领导者也可能因大权在握而堕落为新的特权阶层，即官僚阶级。林钊还批判地指出，马克思在此“无产阶级”概念上是不够清晰的：他忽视了工人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忽视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两种劳动工人之间在地位上的巨大差异，没有对如何防止工人政权退化为压迫性的、官僚的权力进行有力的探讨，以致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应验了巴枯宁的预言。

其次，林钊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与巴枯宁的争论之二，即“谁是革命的领导者”的问题，是工业无产阶级，还是农民？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领导者当然是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因为其他阶级都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消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具有较好的组织性，所以工业无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是革命的先锋队。与此相反，农民是马克思不看好的阶级，由于其财产还未被资本完全剥夺，农民在革命中是保守的甚至反动的，工人阶级只有等待大工业将农民都抛入现代无产阶级的大军中才能等来革命的契机。而在巴

枯宁看来，“破坏的欲望就是创造的欲望”，而农民正是由于缺乏教养而保留了天然的、野蛮的破坏欲，所以在革命中农民才是真正的主力军。林钊发现，在巴枯宁看来，马克思所主张的工人革命是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革命，所以巴枯宁担心这样的革命成功后，新的阶级对抗就会产生，即农民被工人阶级所统治，或普罗大众被少数知识精英所统治。所以说，巴枯宁是较早地发现意识或文化的不平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思想家之一。

随后，林钊介绍了导致马克思与巴枯宁大相径庭的政治主张背后的哲学基础的差异，即“自然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的争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总体上是以自由为目标上升发展的，历史运动的逻辑轨迹是不得跨越的，每一历史阶段的文明成果将扬弃凝结成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基础，所以马克思热情赞扬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成果，而工人阶级正是继承了这一成果而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而巴枯宁则不认同农民的不自由所具有的历史合法性，他痛斥科学的无“心”，责备科学只关注社会的普遍发展而不关心每一个现实个体的偶然命运和个别情况；与马克思相反，巴枯宁认为，自由是每个人的自然天性，是人的本能，而非社会和历史所赋予的，每一个人包括落后的农民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都有按照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来行动的权利。林钊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欧洲的历史，但对于行动中的革命者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可观的吸引力；因为既然历史铁的规律会自然地改变现存的一切，即使不行动，革命也能成功，那么西欧的工人就无需团结起来革命以改变现状；既然历史发展的条件尚未成熟，即使革命也必然会失败，那么东欧的农民就无需团结起来革命，只需默默忍受历史环境带来的苦难和不幸即可。而巴枯宁的学说，虽然学理性不强，但对于行动中的革命者而言却有十分强烈的感染力；为自由而奋斗，对每个革命者而言都是十分强大的动力。

最后，林钊介绍了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争论对历史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马克思虽然在海牙大会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但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与巴枯宁仍未分出胜负，尤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巴枯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担心全部应验后，马克思是否真的是获胜者重新成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另外，无政府主义保持着对专制和等级制度的批判，对人们追求一个自由美好的社会是十分有益的。

接着论坛进入第二个议程，由谭安奎对该报告做点评。谭安奎首先澄清了对追逐权力的看法，即人与人对权力的争夺是根深蒂固的，对权力的追逐并不因其为了崇高的理想而高尚，也不因其追求利益而卑劣；马克思与巴枯宁对权力的追逐，并不因为思想争斗而变得高尚或正当，克尔凯郭尔说，“为了追逐天堂，而使人间变成地狱”，我们看待对权力的追逐不应该戴上有色眼镜。

其次，谭安奎通过政治学理论分析了无政府主义的现代根源。谭安奎认为，近代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无政府主义，因为所有政治学的讨论都是建立在“政治或国家是有必要的”这一前提下进行建构的，那么对“政治或国家是否有必要”这一前提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而无政府主义就是在争论和怀疑政治或国家的必要性。然而，政治或国家的必要性只有在近代才成为问题，因为在古代希腊城邦中，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自然目的论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是自然正当的、无可置疑的；而只有在经过了罗马帝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政治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后，尤其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自然本性与政治相分离后，政治公共生活的隐退以及支配性的权力的凸显，才促使人们对政治或国家的必要性进行争论和怀疑。

然而，在政治或国家中就一定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吗？如何跳出这种关系呢？可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在试图跳出这种关系来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其成效却大打折扣，在理论上对权力的批判越深刻，对理想状态的设计就越天真。“自愿”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然而在社会中人与人的能力差别有多巨大，这种自愿就有多虚伪。

另外，无政府主义产生的又一前提是，非政治的自由即经济（或私人）的领域的凸显，一方面使政治和权力排除在公共生活的焦点之外，另一方面又使经济或物质领域成为政治和权力的焦点。所谓福利国家，实际上是行政国家，是使行政权成为支配性的权力的国家。而马克思与巴枯宁的争论焦点恰恰是，是否保留国家的行政权力。

国家权力要分两个层次，即政治层面和行政层面；政治层面的权力解决“谁来统治谁，国家事务由谁来做决定”的问题，而行政层面的权力解决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国家意志，如何管理国家事务”的问题。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应该解决的是政治层面的权力“扁平化”问题，而非行政层面的自由、平等，可以说，行

政权力必然是自上而下的，在此自由和平等是无效的。而马克思与巴枯宁却围绕着行政权力的去留展开争论，这是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共同的错误。

林钊认为谭安奎的点评十分精彩而中肯，并紧接着对点评进行回应。林钊说，巴枯宁虽然在讨论行政权力层面的权力的去留问题，但他想讨论的问题是，“那种看似为公众服务的行政权，如何才能不堕落为政治性的支配权”，即那种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行政权力，如何不会蜕变成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政治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巴枯宁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随后是自由讨论阶段，在座各位老师和同学主要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展开深入而详细的讨论：（1）无政府（anarchy）的涵义是无政治权力还是无行政权力？

（2）马克思是否是集权主义者，马克思是否应当为苏联的集权主义负责？（3）巴枯宁与自然主义的关系是什么？（4）无政府主义的意义在哪里？

（1）无政府（anarchy）的涵义是无政治权力还是无行政权力？

郭忠华针对谭安奎的点评，提出两个问题即“只要行政权力不要政治权力就是无政府吗”以及“民主就等于无政府或无国家吗”？谭安奎回应说，政治权力是不可能没有的，任何公共生活都有政治权力，关键是政治权力的结构是等级的还是扁平的；民主是指每个人都处于“有管理有服务、无支配无压迫”的公民关系中，民主就是每个人“既统治又被统治”，而无政府如果指巴枯宁意义上连行政权力都没有的话，民主当然不等于无政府或无国家。

而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则认为，“国家”与“政府”等概念不能简单等同起来，“政府”（government）其中“govern”的涵义指“统治、治理以及支配”，它与“国家”（“state”以及“nation”）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而“anarchy”一词在古希腊原初的涵义是，一个城邦重大决策所从出的机构之阙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就是指无政治权力。

针对大家对“无政府”的涵义的争论，林钊回应道，“无政府”的最终状态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十分精准的答案，只能有某种“家族类似”，诸如反集权、反现存政治以及反对各种主义等，而且更多地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该词的；而在十九世纪，该词更多地是指反对神的压迫、反对经济以及反对官员的压迫。这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在使用该词。

（2）马克思是否是集权主义者，马克思是否应当为苏联的集权主义负责？

中央编译局林进平研究员认为，马克思所建构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非是极权主义的，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法兰西内战》中都有对官僚机构和精英的批判，以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这与巴枯宁又有什么区别呢？至于谁是领导者的问题，马克思对工人的堕落也是有过担心和怀疑，而且马克思对农民的看法并非简单地否定，他是在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来看待农民问题的，农民是必然被历史扬弃的对象，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体，农民必然被历史改变。

而中山大学马哲所讲师林育川博士认为，林钊在报告中隐含着马克思要为苏联的集权主义“背书”的意思，并把马克思描述成为一个集权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马克思是不是一个集权主义者，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说社会主义需要国家，我们就说马克思得为苏联的集权主义背书，这是个有些勉强的结论。

针对这一问题，林钊做出了自己的回应：马克思虽然在早年著作中作为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有着深刻批判，但在后来作为政治家时却十分强调第一国际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具有的领导作用，亦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性。在《共产党宣言》以及“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在设计未来的国家蓝图时，都要求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切权力集中在新政权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一个集权主义者。

### （3）巴枯宁与自然主义的关系是什么？

南方医科大学讲师马万东博士认为，马克思毫无争议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但疑问是，巴枯宁是在何种意义上说是自然主义者呢？巴枯宁应该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无政府状态就是原子化的个人所处的自然状态。

而林进平则认为巴枯宁的学说应该归结为自然法，即把自然理解为人的某种性，而不是自然主义。因为巴枯宁与卢梭的自然法是一脉相承的，自然法是一种参照，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建立在自然法即人性的基础之上，巴枯宁的学说也是如此。

同时，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讲师龙霞博士认为，林钊把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归结为自然主义以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相对立，这样的定位是含混的，因为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所讲，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正是政治哲学古今之争的区隔，自然主义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视域，而历史主义

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视域。但巴枯宁或者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哲学，正是落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历史主义的框架之中的。

针对这一疑问，林钊回应说，巴枯宁的自然主义主要是孔德意义上的机械唯物主义，强调自由是人的自然天性。巴枯宁自己的学养较差，亦没有建立起完满自洽的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但他将自由规定为人的自然本性，则对于鼓舞革命行动是十分有力的。

#### （4）无政府主义的意义在哪里？

中山大学马哲所谭群玉副教授认为，林钊用巴枯宁的学说来矫正马克思的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实际上是用更加极端、更加没有建构性的学说来搞革命，那么是否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呢？林育川也认为，无政府主义只有批判的功能，它拿不出比马克思更好的方案来建设新社会。而林钊则回应说，巴枯宁的学说的确在建设性上缺乏建树，但他的学说在否定和批判的意义上则是很有价值的。巴枯宁所担心的，工人领导的政府也可能退化为特权政府、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政府，而这方面是马克思缺乏思考的地方。

与之相反，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邓伟生博士却认为，无政府主义不仅在否定的层面上有意义，而且还在肯定性的、建构上的层面上有意义，甚至意义更大。正是无政府主义才促使我们思考，“国家的存在有无道德理由”，以及“如果没有国家，社会进行组织是如何可能的”等问题。因为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有洛克意义上的“同意”性质，如果现实的政治只是人们相互妥协的结果，那么它将没有任何的神圣性，所谓的爱国就将成为问题，而只有当现实政治建立在人们的道德接受上的话，爱国才是正当的。一个自发、自愿的小型的社会组织，将如何移植到现代社会呢？无政府主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许多相当建构性的想象，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有正面意义的。林钊则回应说，无政府从没有在现实中实现过，它的每一次现实的实践都很短暂，即便无政府主义有相当可观的建构性的想象，那也大多停留在想象的层面上，一旦进入现实，同样可能千疮百孔。

另外，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刘森林教授认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毛泽东从来都没有把无政府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消除出去，文化大革命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大贯彻；农民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等等都



是从无政府主义那里得来的。离开无政府主义就无法理解毛泽东。

马天俊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在探讨现代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在古代，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超乎人类之上的神圣存在物之中，国家或政府的存在合法性没有太多的争论和怀疑；直到近代的自然科学揭示了天上的东西和地上的东西都是一样的物质之时，从霍布斯开始的近代政治哲学中，国家和政府的起源与合法性就开始根基在人与人之间的自愿与契约中了。但即便如此，现代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在当今仍在争论（是“自由”或是“平等”？），仍然处于建构的过程中，仍然是一个问题。然而，只要在现代国家中也还有不平等，那么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

最后，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徐长福认为，“马克思与他的论敌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学界曾经对马克思的研究是单线的，只研究马克思的思想，而忽视了他的思想是在与他同时代的论敌们相互争论中才产生的。另外，徐长福还认为马克思的论敌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论敌，包括鲍威尔、卢格和施蒂那等青年黑格尔派；另一种是马克思面对现实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等实践问题上的对手，如蒲鲁东、巴枯宁和拉萨尔等。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争论焦点是如何看待现状尤其是财产的问题上，财产是盗窃还是分工和生产的结果？与巴枯宁的争论在于为什么革命、如何开展革命上，革命是否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与拉萨尔的争论在于如何建设革命后的新社会，是民主多一些还是专制多一些，社会主义是否需要民主？从现实实践上来看，马克思基本上都错了。但关键问题是，马克思大概都错了却为什么依然那么伟大，而他的对手们必须依附于马克思才能被提及？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政治哲学，包括自由主义的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方案，其背后都预设着现代性的个人自由的目的，在现在看来它们都是有问题的。反思现代性，使我们的实践不致落入虚无主义的深渊，这正是我们学者应该努力做到的。

说明：本纪要根据录音和文字材料整理，未经发言者核对，仅供参考。

附：研习会发言文稿

## 马克思主义 vs 无政府主义

### ——回顾马克思与巴枯宁之争

（林钊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 19 世纪，思想史上一个显著的历史事件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圈子内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无政府主义。他们并蒂而出，却不共戴天；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却彼此仇视；他们都被讥为乌托邦，却向同一战壕里的盟友投掷了比共同敌人更猛烈的炮火。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在马克思与巴枯宁的论战中达到顶峰。他们从现实到理论的交锋既改变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为 20 世纪政治史和政治学史的诸多问题埋下伏笔。

巴枯宁在今日中国已经是不太为人熟知的名字了——人们更多是通过一个伟大作家的笔名而知道他。<sup>1</sup>巴枯宁在中国曾经两度红火，一次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一次是在文革结束后对“四人帮”的批判中，于前者他被当作革命的英雄，于后者他被当作反革命的毒瘤，原因却都是他充满破坏激情的无政府主义。

巴枯宁是马克思的“一生之敌”，他们在 1844 年初次见面时就存在分歧，在 1875 年巴枯宁逝世前一年，马克思还在撰写《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的批判笔记。在马克思学说被无数研究者事无巨细地研究过的情况下，这场长达 30 年、贯彻马克思整个成熟的政治与学术生涯的重要争论竟然没有得到关注。两个证据可表明这一点：其一，学术界对此问题不闻不问；其二，在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史的教材中，巴枯宁被当作十恶不赦的“唯心主义者”和“阴谋家”匆匆打发。这场争论的意义依然未得明了。

#### 马克思与巴枯宁的交往

就个性和生平而言，马克思和巴枯宁有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出身在一个中等家庭，年纪相仿（巴枯宁比马克思大 4 岁）；都富有正义感，都是无神论者，热衷革命，推崇暴力；都曾经是黑格尔主义者，没有完成学术职业的梦想，却对政治实践更有热情；都不拘小节，举止粗鲁，却能轻而易举地在圈子中成为领袖；都不得不流亡海外，经常靠借钱度日，并最终客死异乡。他们都反对剥削的资本主义和封建的贵族制度，但在政治上都反感同为革命者的拉萨尔和马志尼。他们

---

<sup>1</sup> 最近的一部研究巴枯宁的专著是出版于 1982 年的《巴枯宁评传》（李显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以巴枯宁为主题的重要论文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以后几乎没有。

自身便是克里斯玛型的人物，极富魅力，却难以交往，在他们分道扬镳的朋友名单上，都留下一大串闪亮的名字，马克思的包括：鲍威尔、卢格、蒲鲁东，巴枯宁的包括：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赫尔岑。当然，这份名单中还得加上彼此的名字。

然而，这些共同点并不能掩盖他们更多的差异，在导致他们敌对的原因中，性情是一个因素：巴枯宁生性浪漫，马克思则作风严谨；巴枯宁交友轻率，马克思则保持冷漠和怀疑；巴枯宁爱实干，马克思则好研究。种族身份是另一个彼此嫌恶的原因，马克思既是德国人又是犹太人，而巴枯宁则是出名的反犹和反德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两人在学养上不同，巴枯宁较之马克思逊色不少，巴枯宁虽有煽动力，但他没有系统学习过黑格尔哲学，甚至连一部代表作也没有，《国家制度与无政府主义》也只是一个残篇；马克思既能办报，又能撰写大部头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使他成为工人运动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这种学养上的差异，使得后来二人交恶时，巴枯宁称马克思为“高傲的学理主义者”，而马克思则称巴枯宁“蠢驴”和“江湖骗子”。

马克思与巴枯宁总共见过三次面，恰都出现在他们人生重要的关头。1844年流寓巴黎的马克思和巴枯宁第一次相见，彼时他们都是卢格的朋友，也都是《德法年鉴》的作者，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从黑格尔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巴枯宁则在蒲鲁东的引导下从黑格尔转向无政府主义。巴枯宁对马克思充满尊敬，因为他“当时对国民经济学一无所知，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而马克思“已经是个无神论者，有学问的唯物主义者和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即使如此，两人也“从未有过亲密关系”，因为他们“气质是互不相容的，他称我是多情善感的唯心主义者，他是正确的；我称他是背信弃义、阴险的和爱好虚荣的人，我也是正确的。”<sup>2</sup>

第二次见面是在1848年初的布鲁塞尔，两人前后脚都被巴黎政府驱赶来到布鲁塞尔。此时马克思正在写作《共产党宣言》，而巴枯宁则对已经燃点起的革命之火跃跃欲试。此时巴枯宁对马克思已经十分反感了：“他们（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自高自大、居心叵测、无端争吵，理论上不容异说，实践上畏缩不前。……‘资产阶级’这个形容词被他们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虽然他们自己彻头彻尾、根深蒂固地是‘资产阶级的’。”<sup>3</sup>

第三次见面已是1864年底在佛罗伦萨。此时巴枯宁已是欧洲革命的明星人物，他戏剧性地参加了德雷斯頓的起义，却为此做了11年的牢，又奇迹般地从西伯利亚逃回欧洲，革命者中都流传他的故事。而马克思结束了长达14年的图书馆生涯（写作《资本论》）重新进入政治。马克思成立了第一国际，也需要巴枯宁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加入。这是两人间少有的蜜月期，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

---

<sup>2</sup> 巴枯宁：《我与马克思的私人关系》，载《巴枯宁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237页

<sup>3</sup> 转引自爱德华·卡尔：《巴枯宁传》，宋献春、王兴斌、卢容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0页

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其中的一个。”<sup>4</sup>

但蜜月期很快结束，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也意味着马克思迎来了最大的对手，他不仅带来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也带来了马克思权力的威胁。尽管巴枯宁曾写信给马克思表明自己仍是他的“学生”<sup>5</sup>，也向赫尔岑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最坚定、最聪明、最有影响的支柱之一”，<sup>6</sup>但两个巨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决裂了。在1872年海牙大会上，在巴枯宁本人和大部分巴枯宁派代表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大会开除了巴枯宁。并且为了摆脱巴枯宁派的巨大影响，第一国际决定将总部迁往纽约。1876年第一国际解体，巴枯宁则在贫病交加的窘困中逝世。

公允地说，马克思在海牙战胜巴枯宁赢的并不光彩，他“诬蔑”巴枯宁创建了秘密同盟，也夸大了巴枯宁对涅恰也夫事件的责任，而巴枯宁神经质般的行事也确实伤害了工人运动。<sup>7</sup>他们给予对方的那些指责：雅各宾派的专断作风、争强好胜、搞密谋等，其实也是空穴来风。但他们并非自私的政客，也非成熟的政治家，他们相争与其说是为了夺权，不如说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思想。就算巴枯宁没有加入国际，就算排除他们性情上的不合和交往中的误会，他们也必然会因理论主张的迥异而发生冲突，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跨时空的思想中。

### 争论一：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国家？

打倒剥削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所有制，推翻封建的王朝国家以及现代的民族国家是马克思和巴枯宁共同的目标。在革命的终极目标上，两人可谓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取消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那当然是一个无统治、无政府的状态（anarchy），因为连统治阶级的自身存在的条件也会在革命中被消灭。也是在1848年，在大革命浪潮中，巴枯宁明确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目标：“我不害怕无政府状态，而衷心希望无政府状态：只有无政府状态才能把我们从我们不得不长期在其中苟延残喘的那种可诅咒的中庸状态中拖出来。”<sup>8</sup>25年后，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主义状态》中，他更加清晰地表明这个立场：

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敌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下而上地通过独立的完全自由的联合，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但不是没有某些个人和政党的各种不同的、同样自由的影响而组织起来，由自己创造自己生活的时候，人民才会是幸福和自由的。

<sup>4</sup> 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年，1976年，第17-18页

<sup>5</sup> 巴枯宁1868年12月22日致马克思的信，载《巴枯宁言论》，第153页

<sup>6</sup> 巴枯宁1869年10月28日致赫尔岑的信，载《巴枯宁言论》，第176页

<sup>7</sup> 第一国际分裂的细节可见《马克思传》（梅林著）第14章，及《巴枯宁传》（卡尔著）第5卷

<sup>8</sup> 巴枯宁1848年12月8日致海尔维格的信，载《巴枯宁言论》，第16页

这就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人们因此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这个名称。<sup>9</sup>

对于如何实现人民的“自由的联合”，马克思和巴枯宁产生了致命的分歧。马克思的策略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明白：“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sup>10</sup>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马克思重申这一点：“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sup>11</sup>

马克思寄望于建立属于工人自己的国家政权，并肯定这样的国家能够为无产阶级赢得财富和自由。但巴枯宁对国家充满怀疑和警惕，国家本身就是阶级对抗的产物和表现，所以“国家就是暴力、压制、剥削和不义，就是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体系和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石。”并且，“一切国家都是坏的，也就是说，国家按其本性即它的存在的条件的条件来看，是同人类正义、自由和道德直接对立的。”<sup>12</sup>在巴枯宁看来，国家从来就未曾是正义的，从来都是属于少数特权阶级的，它的邪恶本性并不因哪个阶级掌握政权而有所改变，并且，这种邪恶本性会使得反抗者堕落成他所反对的那种人。

在反对“人民国家”时，巴枯宁有一个著名的发问：“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sup>13</sup>巴枯宁所预计的结果是：先进的工人将统治“马克思主义者不赏识的”贱农，发达的德国将统治落后的斯拉夫民族。

有没有可能整个无产阶级都成为国家的主人？但这是个悖论。因为国家就是用来统治的，当全体人民都成为治理者，被治理者就没有了，国家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那有没有可能通过全民普选，选举人民代表来治理国家？巴枯宁斥之为“谎言”：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指国家治理），都会得到一个最可悲的结果：少数特权者统治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或人民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工人，他们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治理人民的欲望。<sup>14</sup>

马克思认为，在通向无政府的自由状态的途中，将不得不经历一段也许会很漫长的过渡状态，也就是建立人民国家，这或许会是“必要的恶”，但这个由占大多数的工人所掌权的国家将会保证人民更快地通向正义。在为第一国际设定的章程中，马克思解释道：“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

<sup>9</sup> 巴枯宁：《国家主义和无政府状态》，马骥聪、任允正、韩延龙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8页

<sup>10</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sup>1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6页

<sup>12</sup> 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1868年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巴枯宁言论》，第131-132页

<sup>13</sup> 巴枯宁：《国家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第192页

<sup>14</sup> 巴枯宁：《国家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第193页

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sup>15</sup>但巴枯宁不会认为这个解释是可信的，因为无法证明“人民国家”是必需的，或相比于过往的种种统治形式它会是一种进步。巴枯宁的反驳是：多数人不可能都执政，必然要成立一个少数人运作的委员会，这个少数人的集团无疑将由那些拥有更高知识或更具能力的人组成；在他们掌握国家权力后，并且是掌握了一个集权制的、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的国家权力后，由于人性天然对权力和利益的贪恋，他们将堕落成为新的特权阶级，也即所谓的官僚阶级。在这里，“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的状况没有得到什么改变。

对官僚阶级的警觉是巴枯宁有别于马克思的一个关键之处。巴枯宁发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并不清晰，就像从前人们曾团结在笼统的“人民”旗帜下反抗王制，但人民最终分化为资产者与无产者，“无产阶级”也将在革命后分化为官僚阶级和劳动阶级。这一分化其实已经隐含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中，马克思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并未认真处理，他相信“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sup>16</sup>。而巴枯宁则发现，尽管都受迫于资本，但那些领工酬（wage）的劳工（laborer）与拥有薪水（salary）的雇员（employee）依然存在着阶级差异，他们之间的差异将在资本被人民国家占有后演化为对抗关系，也即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特权被废除了，智力与教育上的特权依然保留，统治权将落入到有教养者手中，劳动者受压迫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于是，反对“科学（家）暴政”成为巴枯宁反对国家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国家这个问题上，巴枯宁和马克思冲突不可调和。巴枯宁强调了他和“学理主义革命者”的根本区别：“他们仅仅是现存政权的敌人，因为他们希望取而代之；他们仅仅是现存政治机构的敌人，因为这些机构排除他们建立专政的可能，但他们同时又是国家政权的最热情的朋友。”马克思的首要敌人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为了消灭资本，必须建立新政权来占有从前属于资本家的资本；而巴枯宁的首要敌人是国家，只要国家还保留——任何形式的国家，从前的一切的不平等，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就仍将存在。马克思强调，在现阶段消灭国家是不合时宜的，且“本末倒置的”，只要阶级消灭了，政府的专政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sup>17</sup>这种转变将是“自行的”和漫长的。在巴枯宁看来，期待国家自行消除是一种幼稚的轻信。虽然国家政治是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但它同样给予了经济特权有力的保障和强化，“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私有财产及其作为资本的剥削能力，都是来源于国家法权的保护。如果说必须对历史脉络远观才能发现，只有经济关系的改变才足以改变法权关系，那么对于行动中的革命者来说，权力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完全一体、难分因果的。消灭法权与消灭资本必须同时进行。

<sup>15</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9页

<sup>16</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sup>17</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3页

在马克思对《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的摘要中，没有回应对他热爱权威的指控。倒是恩格斯在《论权威》的短文中提早讨论到了。恩格斯问：“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sup>18</sup>恩格斯的意思是，权威（国家）是必须的，只要保证该权威受成员委托的性质就可以了。而巴枯宁的反驳是，如何保证？能力较逊的群众如何能够摆脱被能力卓越的管理者的操控？唯一的可能——按照巴枯宁给出的答案，乃是彻底抛弃自上而下的集权机构，建立起各小单位（如地方社区、小范围工会等）自下而上、自发联合的“联邦”。唯有分权化的组织形式方能避免新的专制君王出现。马克思与巴枯宁的争论没有书面的结果，现实的历史似乎给出了偏向巴枯宁的答案。

## 争论二：谁是革命的领导者？

对身处资本主义最活跃的西欧的马克思来说，革命的领导者当然是现代工业下的无产阶级，也即工人阶级，因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sup>19</sup>工人无产者饱受异化之苦，除了锁链一无所有，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他们人数众多，并将被技术工厂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只有他们才掌握埋葬资产阶级的武器——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并依靠此技术将人类带入物质更丰富的未来社会。基于这些原因，工人阶级将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革命先锋队的角色。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农民并不是积极的力量，他们和手工业者及小商人们一起是变革社会中即将没落的中间等级，“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sup>20</sup>农民是马克思最鄙夷的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虽痛恨资产阶级，却幻想着倒退到前工业时代去，并且，由于他们的财产尚未被资本运动剥夺干净，他们因害怕失去这些残剩的财产而在革命洪流前畏首畏尾，犹豫不前。也正是出于对农民阶级的不信任，马克思经常强调革命需要等待时机成熟，也就是等待农民进入被剥削的工业无产者队伍中来。即使在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之后，农民阶级也是必须消灭的对象，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建立政权后的十条措施中，有四条都是针对农民的：比如剥夺地产、按照总计划开垦荒地、在农业方面成立产业军，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sup>21</sup>

来自于农奴制俄国的巴枯宁对革命的期待比马克思更加急迫，他相信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农民正是革命潜在的支持力量，只要工农联合起来而不是单纯依靠工人革命，革命就能在全欧洲迅速发动起来。

巴枯宁之所以认为农民也是革命的主力，是因为在关于革命的理解上，他和

---

<sup>18</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

<sup>19</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sup>20</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sup>2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294页

马克思看法不同。马克思认为革命是一个建设性的行动，工人起来反抗，不是要摧毁那些压迫他们的机器，而是要成为机器的主人，让其为我所用。而巴枯宁坚信，革命是一场坚决的破坏。他有着根深蒂固的革命浪漫主义思想，早在他年轻时刚接触黑格尔哲学时，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便是“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sup>22</sup>。这个信条贯穿他人生始终。他要求革命者“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日日夜夜只应该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sup>23</sup>他相信革命的全部秘密就是“必须摧毁一切，特别是和首先是摧毁财产和它的必不可免的后果——国家。”<sup>24</sup>为什么革命就是破坏？因为巴枯宁对资本主义文明抱有卢梭式的贬斥。与马克思给予资本主义文明热情的讴歌不同，巴枯宁的评价冷淡得多：文明就是“特权阶级的福利、舒适、奢侈以及文雅的和蜕化的思想的发展，是以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和无知为必要条件的”，<sup>25</sup>革命者必须是“这个文明世界的无情敌人。”

在巴枯宁看来，在破坏文明这个事业上，农民会是值得信赖的群体，他们缺乏教养，纯朴而野蛮，拥有更加接近自然的正直道德和本能冲动，也对这个充满腐化和欺诈的不自然的“文明”世界抱有更深的敌意。巴枯宁相信，城市产业工人的革命只要不将城市所主导的等级秩序加于农民头上，农民是会马上加入到工人的事业中来的，因为工人与农民在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并无二致，只是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区别。

巴枯宁强调工农联盟共同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担心若非如此革命难以成功。一方面，工人凭借其“先进的”意识鄙视农民，将其置于被动甚至反动的地位上，那在农民人口众多的东欧，农民将会起来抵抗并最终绞死工人革命。另一方面，即使工人革命成功了，它消除了城市内工人与雇主的阶级分化，却将导致城乡的分化以及和更大范围内东西欧的分化。那样一个引发新的不平等的革命同样难言成功。

巴枯宁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都极其敏感。马克思所主张的工人革命在他看来是一场精英主义色彩极浓的政治行动，它的结果是经济上的不平等由意识上或文化上的不平等所取代。在点评巴枯宁著作时，马克思说：“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在从他们的状况来看他们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sup>26</sup>由是，无产阶级必须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这种情况正是巴枯宁所担心的，在工人革命中，农民只能作为附属参与，那在革命后，无产阶级国家也将完成资产阶级要干的事：使农村屈服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新的阶级对抗表现为：农民被工人阶级所统治，或者普罗大众被少数知识精英所统治。

巴枯宁反对一切不平等的统治，很早就预见到了意识（文化）不平等可能导

---

<sup>22</sup> 巴枯宁：《德国的反动》，载《巴枯宁言论》，第3页

<sup>23</sup> 巴枯宁：《革命问答》，载《巴枯宁言论》，第164页

<sup>24</sup> 巴枯宁：《国际兄弟同盟的章程和纲领》，载《巴枯宁言论》，第146页

<sup>25</sup> 巴枯宁：《国际革命协会纲领》，载《巴枯宁言论》，第86页

<sup>2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94-695页



致的后果，而他所期待的工农联盟的革命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也必须同时是文化的和教育的。这种暗含反智倾向的平等主义主张后来被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所吸收，并呈现出它有害的一面来。

### 争论三：自然主义还是历史主义？

导致马克思和巴枯宁在政治主张上大相径庭的，终究是背后哲学基础的差异。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已然熟知：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特别强调：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27</sup>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承，也就是说，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都认为历史总体上是以自由为目标上升发展，逐步靠近。历史运动的逻辑轨迹不得跨越，每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文明成果都将经扬弃凝结成新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基础。自由与人性都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它们在石器时代与在机械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就如同手推磨产生了封建时代下人的自由状况，机器大工业将刻画未来人类的自由蓝图。基于此原因，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工人阶级由于能够继承这些伟大的文明成果，所以势必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解释欧洲历史时展示了无可争辩的真理性，但当他作为政治家运用此“科学”指导全欧工人运动时则遇到了“历史主义”的麻烦。如果说西欧的工业文明发展已然到了淘汰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地步，那么西欧工人就无需“团结起来”夺取政权继而剥夺资产阶级的资本，历史的铁的规律性自然会改变这一切；而对于东欧的农民阶级来说，他们亦无需革命，因为物质条件显然尚未成熟，他们革命必然失败，只能默默忍受历史环境所规定给他的苦难和不幸。

巴枯宁当然不会认同农民的不自由竟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他痛斥：“科学没有心：它最多把它看作一种智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材料。它对张三或是李四的特

---

<sup>27</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别情况和偶然的命运有什么关心？”<sup>28</sup>巴枯宁不允许个人自由服从于历史逻辑的强力，推动历史变动的不是逻辑，而是无数活生生个人的喜怒哀乐的生活。难道一个俄国农民天然就没有资格像英国工人那样追求政治自由？巴枯宁所秉持的自由观是自然主义的，而非黑格尔式的进化论。

巴枯宁说：“人的自由只存在于：他服从自然法则，因为他靠他自己才认识了他们，却不是被任何神的或是人的、集体的或是单独的那种外来意志所从外界加在他身上的。”<sup>29</sup>这意味着，自由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巴枯宁还说，自由不是“有限的、形式上的、严格地为国家所规定出来的自由”，而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求得任何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是他们“只听从自己良心和理性决定”<sup>30</sup>的能力。自由当然是人的完美的人性，马克思会认为，完满的自由出现在历史的尽头，是人对自然的最大限度的摆脱，也是人的社会性交往达到最少障碍的地步。而巴枯宁则认为，自由就是人固有的天性，社会交往已属于人固有的天性，但一个社会的非自然化的发展，比如国家权力的巩固，将使人类离自由愈行愈远。

在自由观上，马克思与巴枯宁有两个关键的分歧：其一，对巴枯宁来说，自由是人的自发性的本能冲动，如他所言：“创造生命的是生命而不是科学，只有人民自己的行动才能创造人的自由。”<sup>31</sup>对马克思来说，自由不是本能行为，而是人有理性、有意识地控制周遭世界和自己的行为，这种能力是在社会生产中不断提高的。由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32</sup>所以人的自由状况（包括政治自由）受他的前人所留下的社会条件所限。其二，对巴枯宁来说，自由是“人支配自己本身和按照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来行动的权利”<sup>33</sup>。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巴枯宁的自由观还停留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阶段。因为独立的个人听凭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行动是非常虚幻的想象，在高度交往、相互依存度极高的社会中，那种孤立的、与他人为敌的个人在面对庞大的社会机器时根本就是无力而无助的。只有在充分社会化的“人类”中，人才有资格做主人、谈自由，不管是对自然而言，还是对社会而言。

梳理了两人在自由概念上的差异，就能很好理解他们在实践主张上的不同了。马克思希望发达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能率先发动革命，而巴枯宁要求革命在全欧同时发动；马克思希望通过建立广泛的国际工会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巴枯宁则认为只需一支秘密部队，鼓动人民天性中的自由本能即可。马克思希望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抵制资本主义的堕落和粗鄙，带领人类进入一个推崇高贵价值的社会，巴枯宁则信赖野蛮的农民阶级和流氓无产者，因为他们的破坏热情更高涨。马克思要求迅速占有资产阶级生产资料以保证新政权稳定，而巴枯宁要

<sup>28</sup> 巴枯宁：《上帝与国家》，朴英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sup>29</sup> 巴枯宁：《上帝与国家》，第24页

<sup>30</sup> 巴枯宁：《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载《巴枯宁言论》，第73页

<sup>31</sup> 巴枯宁：《上帝与国家》，第60-61页

<sup>3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sup>33</sup> 巴枯宁：《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载《巴枯宁言论》，第83页

求把所有制和国家政权一并废除。

## 小 结

马克思与巴枯宁的权力之争随着马克思在 1872 年海牙大会上的胜利而告一段落，而他们的思想之争在两人都逝世后却依然延续，马克思亦赢得了除西班牙外所有战场的胜利——西欧、俄国及中国，但两人之间的最终的胜负却依然未分。在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中，都明显存在着巴枯宁主义的影子：依靠农民，拒斥选举，相信通过激发群众的革命意识，落后的农业社会也可以进入发达工业国家才有条件进入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西欧，巴枯宁对官僚制的警惕甚至引起了韦伯的注意——韦伯的青年时期正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激烈争斗的时候，韦伯发现，更加高效的官僚制将把人类装进新的“铁笼”中。卢卡奇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同样延续了巴枯宁的思考：在文明程度最高的西欧工业国中，为什么没有发生决定性的社会变革？随着技术的进步，无产阶级的自由意识为什么没有随之增强？同样的问题还刺激了葛兰西，这位共产党总书记的祖国正是巴枯宁晚期常住并影响深远的地方，他反思的结果与巴枯宁的革命策略不谋而合：加强文化上的领导权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与资本主义体系作彻底的文化斗争。

巴枯宁主义和它的创始人一样名声不佳：它被认为是许多可怕思潮的源头：乌托邦主义、虚无主义、反犹主义和恐怖主义，但只要它保持着对专制和等级制度的批判，它就依然有助于人们追求一个自由美好的社会。而只要考虑到巴枯宁的批评在后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兴衰中几乎全部应验，重温他与马克思的交锋就依然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 简讯 •

## 异质性哲学的包容性和批判精神

——“第一届异质性哲学研讨会”顺利召开

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徐长福在其新著《拯救实践》第一卷中所系统性地阐发的一套原创性的哲学理论——异质性哲学，已得到学界同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为了扩大这项学术成果的影响力，也为了促使有兴趣的同仁，特别是青年学者参与这条新的理论进路的开掘与拓展，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肇庆学院和肇庆市哲学学会（协办）于2012年12月22-23日在肇庆市召开了“第一届异质性哲学研讨会”。来自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重点高校的三十余名学者，以及重庆出版集团、《哲学动态》、《学术研究》、《求是学刊》和《教学与研究》等媒体和科研单位参与了会议。

会议围绕着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的新著《拯救实践》第一卷的相关内容进行热烈地讨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萧诗美教授指出，《拯救实践》所阐释的一整套异质性哲学原理其创新性和意义体现在问题、方法和理论上，它既具有批判的意义，又具有拯救的意义。异质性哲学最可贵之处是把同质性和异质性的抗争关系放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来把握，因而拒斥同质性、捍卫异质性，最终目的是解放直观和拯救实践。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马天俊教授认为，《拯救实践》中所阐发的异质性哲学有自己时代性的问题意识、独创性的概念工具、针对性的学理脉络，以及担当性的现实关切。并指出，关于异质性哲学的学术讨论将成为其生成史的一部分，也将是其思想史效应的一个原始的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强乃社副编审指出，后教科书时代的哲学研究都是哲学重建话语努力的尝试，异质性哲学研究是从实践哲学路径做出努力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异质性哲学研究可以被看作实践哲学的新路径。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韩志伟教授从异质性哲学视角考察了康德的实践哲学。他指出，康德先验哲学中关于直观与概念的区分是理解其实践哲学异质性问题的前提，基于这个前提，人类无法认识作为实践根据的自由因，只能反思作为实践形式的道德律，进而在实践哲学中通过道德律展现在先验哲学中拯救出来的自由。但是，作为人类道德实践领域的最高理想类型的道德律，也仅仅是人类不断开放的实践领域中的一种自由类型，其中的异质性问题需凝神思索。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院长黎玉琴教授总结道：本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异质性哲学的包容性，这或许预示着异质性哲学在未来真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哲学样态。

（复旦大学 张守奎）